

胡范铸 主编

中国 青年 语 用 学 者 丛 书

社会语用学 案例研究

陈佳璇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ZHONGGUO QINGNIAN
YUYONGXUEZHE CONGSHU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语用学案例研究/陈佳璇著. —上海:上海
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2
ISBN 978-7-5520-0070-2

I. ①社… II. ①陈… III. ①社会学-语用学-研究
IV. ①C91-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91821 号

社会语用学案例研究

著 者: 陈佳璇

特约编辑: 胡 周

责任编辑: 陈如江

封面设计: 王斯佳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长城绘图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开

印 张: 6.25

插 页: 2

字 数: 16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0070-2/C·049

定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序： 语用学的希望与青年学者的使命

胡范铸

在中国语言学的各分支中，语用学是相对非常年轻的一门学科。不过，即使如此，当年最早致力于从西方引进语用学理论的学者，也大半已经退隐。导夫先路者既已功成身退，则积薪而上者更有待后来。

学术的理想境界应该是“有激情的理性”，“有思想的学问”。如果说理性需要锤炼，学问依赖积累，那么，激情和思想更属于青年。中国语用学迄今为止在整体上基本上还停留在介绍、引进和消化的阶段，在诸如语用学的根本目标、语用学的主要问题、语用学的核心概念、语用学的分析方法等一系列基本命题上，都还缺乏中国学者自己的思考。可以说，中国的语用学研究特别离不开青年的激情创造和思想探索，没有青年不但没有语用学的未来，甚至没有语用学的现在。

由此，“中国青年语用学者丛书”试图聚集起中国语用学研究中的一群年轻人，一群正届而立的学人，一群充满创造力和探索欲的青年，开始一种自己的思考。

这套丛书的第一辑三种，包括陈佳璇的《社会语用学案例研究》、陈丽君的《基于资源概念的旅游语言研究》和甘莅豪的《空间动因作用下的对举结构》。

陈佳璇的《社会语用学案例研究》努力探索的是社会语用学问题。如果说语用学在我国学术界尚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则社会语用学更是一个相当缺乏讨论的领域,对于这门学科的基本范式可以说都还在摸索之中。在国内一些学者看来,所谓“社会语用学”,主要就是研究“社会用语的规范”问题,如称呼问题、礼貌语言问题等等。而我则以为:所谓社会语用学,并非只是“语言规范化”研究对“社会用语”的拓展,而是整个的语用学与社会学的一种结合,是语用学的问题与技术同社会学的问题与方法的一种深刻的结合。因此,这不但需要一种对于语用学理论和社会学理论的深刻理解,更需要一份深刻的社会关怀和强烈的创造意识。

作为我国第一部综合运用语用学和社会学的方法对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重大语言问题加以探索的语言学著作,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语用学”研究,陈佳璇的《社会语用学案例研究》的最重要的特点在于它的问题意识、方法意识和探索意识:从西方社会学名家“布迪厄社会语用学的基本范畴”、“得体原则是不是语用的最高原则”到“汉语询问范畴研究的既有范式及其问题”,从“间隔号用法的发展和统一”、“关于《规范通用汉字表》研制及相关问题的讨论”到“字母词概念的重新界定”,从国家语委“新词语的发布”、“中文危机和高校自主招生”到“国际汉语教育”,从“国家形象修辞”、“塔利班修辞诉求”到“计划生育标语的言语行为”,从“刑事案件当事人的身份称谓”、“法律语言的易读性”到“非婚生子女的抚养义务”,从“火星文”、“新闻语言”到“中国高校改名的现状、问题与对策”……本书讨论的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当代社会语言运用的重要问题,而且其中牵涉到语言规范化、语言教育学、政治修辞学、法律语言学、传播语言学等各种领域,视野之宽、范围之广,在青年语言学者中是相当罕见的。其中所采用的方法,更是相当丰富,从“概念分析”、“研究范式分析”到“互文性分析”,从“规范化研究”、“言语行为研究”到“修辞诉求研究”,从“易读性测量”、“义

域语言研究探索了一种新的可能,并为中国旅游产业的发展,为旅游生活质量的提升,作出了语言学者的贡献。

甘莅豪的《空间动因作用下的对举结构》则可以说是一项借助“空间语法”假设而努力打通语用与语法的工作。句子有“合法”的和“不合法”(亦即“非法”)的,这是一个惯常的认识。但今天越来越多的语言学者不仅已经意识到句子的“合法”与“不合法”是相对的,它们之间是个连续统,是个程度也就是“合语法度”的问题,并且还看到,许多不合语法的句子的“合语法度”在一定条件下是可能立刻发生变化的,而导致变化的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对举”。但是,哪些类型“非法句”的“合法度”能够在对举中获得改变?对举结构可以改变句子“合法度”的根本动因是什么?它与其他改变句子“合法度”的动因的区别和联系是什么?等等,学界尚未给予有效的说明,而这正是本书试图解决的问题。

语言和空间的关系一直是语言学界的重要命题,但这一命题其实包含了两个不同的视角,一是关注“语言叙述的空间”,一是关注“语言存在的空间”。所谓“语言叙述的空间”,是指人怎样通过语言认知空间;所谓“语言存在的空间”,是指人怎样在空间中组织语言。迄今为止,语言学界研究的基本上都是“语言叙述的空间”;但由于语言的书面形式必须占有一定的空间,语言各项活动必须在一定空间中展开,受语言符号所处空间的影响和作用,语言符号的呈现方式、结构关系也可能发生相应的变化。对于这些变化的研究则应该成为“语言存在的空间”的重要课题。依据这一假设,《空间动因作用下的对举结构》指出:“对举结构”就是“语言存在的空间”制约产生的一种现象。从语言形式上看,对举结构具有一个很典型的特征,就是在线性语流中,两个或者多个字数、结构、词汇等形式相近的单位对举,由此不但在语流中被凸显出来,人们很容易把它们和其他语言单位单独区分开,并且还形成相对闭合的空间——对举空间。对举空间的格局会营造出一个“微语境”。在此

“微语境”中，人们通过一系列“空间组织规则”来构建和组织语言符号的关联性。这些“空间组织规则”包括：相似规则、完形规则、简化规则、隐退规则、凸显规则、交流规则、稳定规则。在“空间组织规则”的作用下，彼此相邻的语言符号在对举空间中优先互相影响，这种影响又作用于句法，进而有效地转化“非法句”的合法度。由此，《空间动因作用下的对举结构》构建了一个很有个性的解释模型。

小荷露角，新松日高。这里只是“中国青年语用学者丛书”的第一辑，以后还将有第二辑、第三辑……

记得自己当年动手写作《幽默语言学》时，还是大二的学生；动手撰写《钱钟书学术思想研究》时，也还是在大三，当时只是觉得“语言的幽默”、“钱钟书的学术思想”等等很有意思，于是冒冒失失地就自己动起手来，不料竟然还就一举成书出版。30年过去，如今看来，尽管这两本书依然不断被人引用，不过粗疏之处自己是越看越多，大有“颇悔少作”之心。如今，“中国青年语用学者丛书”自然也不可能尽善尽美，其中的稚嫩甚至舛误在所难免。但是，对于这样一群有个性的青年学者，我依然有理由预卜他们未来有更大的成功——尽管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最后，特别要感谢前美国中国语言学会会长屈承熹先生和中国修辞学会会长陈光磊教授对本丛书的关心和指导。

是为序。

2012年6月于卧看云舒云卷居

目 录

总序：语用学的希望与青年学者的使命	胡范铸
.....	(1)
第一章 绪论	
.....	(1)
第二章 社会语用学理念探索	
.....	(4)
第一节 “社会语用学”的基本概念：布迪厄的思想	 (4)
第二节 “得体”还是“意图实现”：何为修辞语用的“最高原则”	 (17)
第三章 语言规范化讨论	
.....	(28)
第一节 “专名化”与“均衡美”：间隔号用法的发展和统一	 (28)
第二节 “路径依赖”与“社会成本”：《规范通用汉字表》研制中的问题	 (36)
第三节 “公共性”与“单词性”：字母词概念的重新界定	 (41)
第四章 语言教育学分析	
.....	(50)
第一节 “规范”还是“推介”：作为修辞行为的“新词语”发布	 (50)

第一章

绪 论

本书进行的是一项旨在运用具体“案例”探索“社会语用学”的工作。

所谓“社会语用学”(Social pragmatics),在西方是一门新兴的跨界学科,在中国更是一个相当缺乏讨论的领域,因此,对于这门学科的基本范式可以说都还在摸索之中。

在西方学者看来,社会语用学是社会学和语用学的结合,哈贝马斯、塞尔等对此都有所论述。西方杰出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更是在他的著作中通过依据语言事实的思考和对于语言活动的思考,通过对于语言学研究的反思性分析,提出了一系列社会语用学的概念。布迪厄的社会语用学分析,将语言看作是一种市场交换行为,并以“实践”为基本价值取向,由此用“利益”、“场域”、“资本”、“惯习”等范畴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创造性地回答了行动者为什么实践、在哪里实践、用什么实践、如何实践等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命题。

而在国内一些学者看来,所谓“社会语用学”,主要就是研究“社会用语的规范”,如称呼问题、店名问题、路牌问题、礼貌语言问题等。

我们以为:所谓社会语用学,并非只是“语言规范化”的研究从书本拓展到“称呼”、“店名”、“路牌”等狭义的“社会用语”,“社会语用学”应该是具有社会关怀、社会学视野和社会学方法的语用学,是整个的语用学与社会学的一种结合,是语用学的问题和

这一探索包括:从“间隔号用法的发展和统一”、“《规范通用汉字表》研制中的问题”到“字母词概念的重新界定”;从国家语委“新词语的发布”、中文危机和“高校自主招生”到“国际汉语教育”;从“国家形象修辞”、“塔利班修辞诉求”到“计划生育标语”的言语行为;从“刑案当事人身份称谓”到“法律语言的易读性”到非婚生子女的“抚养义务”;从“火星文”、“新闻语言”到“中国高校改名”的现状、问题与对策……其中所努力关注的,可以说基本是当代社会语言运用的各种各样的重要问题,而且牵涉到语言规范、语言教育、政治修辞、法律语言、传播语言等各种领域——尽管其中不少问题我国语言学者一向都很少关注。

而我们在分析跨度很大的这些问题时所采用的方法也必须不拘一格:从“概念分析”、“研究范式分析”到“互文性分析”,从“规范化研究”、“言语行为研究”到“修辞诉求研究”,从“易读性测量”、“义素分析”到“社会认知调查”,不断变换方法和分析技术,其中展示出的分析路径,既有语言学的,也有社会学的。

总之,面对“社会语用学”这样一个全新而又广阔的领域,我们无法立刻绘制出精密的“海图”,只能够先尝试以一个个“岛屿”(问题)的存在来大致显示“海洋”(学科)的可能格局,以避免只把某“一片水面”认作是“整个大海”的偏差。

第二章

社会语用学理念探索

第一节 “社会语用学”的基本概念： 布迪厄的思想

当代法国学者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0—2002),被称为当代西方一位杰出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但是,人们常常可以看到在“一辈子就是在与各种任意分割的学科疆域做斗争”^[1:196]的布迪厄著作中也充满了依据语言事实的思考和对于语言活动的思考,看到他对于语言学研究的反思性分析,可惜的是,在中国学术界,布迪厄的语言学思想,尤其是其中的社会语用学思想,还并没有引起应有的关注。

社会语用学是社会学与语用学的结合,哈贝马斯、塞尔等对此都有所论述。布迪厄全部学术思想的核心可以概括为力求理解文化生活中的基本结构和权力动力学,而他的社会语用学分析,正是这一思考的重要部分。

一、“实践”:社会语用学的价值取向

作为社会学语用学的话语科学今日尚处空白,尽管它有众多先驱者。^[2:136]

那么,布迪厄是如何展开自己的社会学语用学思考的呢?或者说,其倡导的社会语用学的基本价值和核心概念是什么呢?

布迪厄的学说,一向被称为“社会实践理论”。对于布迪厄来说,语言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语言分析的根本目的应该是解决社会“实践”。

布迪厄的“实践”(Pratique)指谓的是人类一般的日常性活动,包括生产劳动、经济交换、政治活动、文化行为和日常生活等。

由此,布迪厄强烈地批评了 20 世纪从索绪尔到乔姆斯基的语言学传统。在这一传统中,其基本特征是“赋予共时性的、结构的或内在性的视角以优先性。认为这些因素在分析上比语言的、历史的、社会的、经济的或外在的决定因素重要”^[1:186]。语用学的出现部分地颠覆了这一学术传统,把语言首先看作是一种行为,但布迪厄认为,在进一步分析时,已有的“纯粹语用学”研究却往往还是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对语言“斩断了与它的实际运用之间的任何关联,并剥夺了它的所有实践功用和政治功用”^[1:188]。

布迪厄认为:索绪尔的语言观是一种“不偏不倚的旁观者”的语言观,这一语言观将“语言”与“言语”对立,将语言的“共时”与“历时”对立,将“逻各斯”与“实践”对立。他认为:“结构主义区别了语言和语言在言语中的实现,后者即实践和历史中的语言”^[1:188],而这种“语言与实践的对立是一种典型的学究式的对立”^[1:187],语言学“必须同时既是结构性的,又是生成性的”^[1:197]。

从严格语言学角度看,任何人都可以说任何话,一个士兵可以命令他的上尉去“清扫厕所”;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事实上这正是奥斯汀考察恰当条件时所采取的角度),很明显,并非任何人都可以宣布任何事,否则他这样做将会冒风险或是触犯他人:谁都可以在公共场所高叫,“我命令全民总动员”,但是由于缺少必要的权威,这通常不能成为一种“行动”,这样一种言说仅仅是语词而已^[1:197]。

据此,布迪厄尖锐地指出:不但“合乎语法并非产生意义的充要条件”,就是以分析“语言的运用”为己任的语用学者,似乎常常

也忘记了“创造语言并不是为了语言学分析,而是用来说话,用得体的说话”^[1:188]。

如果不把语言实践放在各种实践共存的完整世界中,就不可能充分理解语言本身。^[1:197]

可以说,社会实践理论是布迪厄思想的集中体现,他要解决的是:行动者为什么实践、在哪里实践、用什么实践、如何实践等一系列命题。就语言现象而言,布迪厄认为语言是一种市场交换行为,并由此用利益、场域、资本、惯习等等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创造性地回答了这一系列相互联系的问题。

二、“利益”:语言市场交换行为的动力

“利益”概念,尽管布迪厄说“只是把这个观念作为临时性化约手段,可以把唯物主义探究问题的方式引进文化领域”^[1:158]。其实,却是布迪厄社会语用学分析的一个出发点。

任何言语行为都有一定的意图^[3],“意图性”或者说“合意性”可以说是言语行为的本质特点^[4]。布迪厄特别强调意图中“利益”范畴的作用,他“经常引用韦伯对法律的一段评论,只有当遵从规则的利益大于无视规则的利益时,社会行动者才会遵守这项规则”^[1:157]。

当然在布迪厄看来,基于社会实践理论的语用分析中的“利益”概念并不是一般经济学心目中的利益^[5:87],这是一种“历史的建构”^[1:159]。由此,他进一步提出了这样几个概念:

“超功利性”——这是与“利益”观念相对的概念。

“漠然”——与“利益”相对,但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超功利性”,“就是不为游戏所动:对我来说,这世间游戏根本不起什么作用”。而为何游戏不起作用,原因又是不同的:“漠然是一种价值

论上的状态;是一种伦理上的不偏不倚状态;还是一种知识上的状态,众人注目之事,我却无力辨别。”[1:158]

“幻象”——在“漠然”的另外一端,则是“幻象”。“所谓幻象,就是一种心神的投入,投入游戏,又被游戏牵着鼻子走。”[1:158]也就是,不但特别强烈地发现一种利益,并且过于看重利益实现的状态。

布迪厄的“利益”并不仅仅是行动者自身的利益,他曾经非常深刻地指出:任何语言产品的生产,不仅仅取决于行动者自己的意愿,同时,还必须加上对市场裁决的预期:

语言生产不可避免地要受对市场裁决的预期的影响。[2:63]

对于市场所固有的规律以及体现市场规律的裁决的认知与认可,决定了对话语的策略性调整。即在合法发音的代表在场时,他们是否注重“校正”自己的低级发音,并且更为普遍地进行所有的校正。[2:65]

对于潜在报酬或者惩罚的实践性预期,是对一定的语言和社会能力与一定的市场(正是在此市场中这一关系得以实现)之间客观关系现实的一种实践性的准物质性的感觉。[2:69]

也就是说,语言活动中一个完整的利益,不仅仅包括说话者的“初始”利益,还包括了对市场裁决(接受者利益)的预期。例如,在新闻言语行为中,作为“第四权”的“记者的权力”便日益受到由读者和广告客户构成由“市场需求”压力的深刻修改。[6:68]

由此,“利益”不但制约是否实施言语行为,还制约了以何种状态去实施言语行为。

三、“场域”:语言市场交换的空间关系

“场域”(Field),即语言实践空间,回答的是语言交换行为的

“利益”在何处产生和获取的问题,也就是在行动者何处实践的问题。

语言学向来有“语境”(语言环境)、“语体”(语言体式)、“语域”(语言领域)的概念,其中“语境”通常指称直接决定语言使用的语言的和非语言的条件,“语体”、“语域”则大体而言是指称由于一系列语言特征不同而呈现的语言活动领域的差别。

布迪厄的“场域”与之相关却并不相等,指的是主要由语言外参数构成的,一定社会空间联系,是各种力量调整定型的“某种被赋予了特定引力的关系构型”^[1:17]。

一条信息的意义和社会效力只有在一个既定的场域(例如新闻业或者哲学界)中被决定,而这个既定场域又处于一个与其他场域相关联的等级关系网络中。^[1:198]

在布迪厄看来,“场域”与“社会宇宙”(social universe)、“社会世界”(social worlds)是一组概念:“社会宇宙”大致相当于通常意义上的社会,复数的“社会世界”相当于构成社会的各个具体的社会领域:

社会生活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将自身分割为经济、政治、审美、知识等不同的生活秩序。每个场域都规定了各自特有的价值观,拥有各自特有的调控原则。这些原则界定了一个社会构建的空间。在这样的空间里,行动者根据他们在空间里所占据的位置进行争夺,以求改变或力图维持空间的范围和形式。^[1:17]

布迪厄之所以摒弃“语境”、“语体”、“语域”概念不用,而另外寻找自己的表达方式,是因为在他看来,一个分化了的社会,并非

一个浑然整合的总体,而是由遵循着自己的运作逻辑的不同游戏领域组合而成的。

一个分化了的社会并不是一个由各种系统功能、一套共享的文化、纵横交错的冲突或者一个君临四方的权威整合在一起的浑然一体的总体,而是各个相对自主“游戏”领域的聚合,这种聚合不可能被压制在一种普遍的社会总体逻辑下,不管这种逻辑是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的还是后现代的。〔1:17〕

也就是说,社会世界是由相对自主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所谓的小世界,就是布迪厄认为的客观关系的空间,也就是场域。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社会世界是有大量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这些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而这些小世界自身特有的逻辑和必然性也不可化约成支配其他场域运作的逻辑和必然性,也就是说,不同的场域具有不同的游戏规则。

与一般语用学理论中“语境”、“语体”、“语域”不同,布迪厄场域概念的意义在于:

首先,“语境”、“语体”、“语域”分析通常是比较静止地思考问题,至少是把对象“静止化”,而场域概念却直接体现了布迪厄的关系主义的思维方式:场域概念则不仅是“关系”以及“关系”变化的产物,也包含着种种变化的关系。

其次,“语境”、“语体”、“语域”分析通常是“语言结构优先”,以分析语言结构的变化(所谓“语言本体”)为旨归;场域概念则是语言结构的外部“力量关系优先”,首先关心的是“力量关系”的彼此作用。即使是体育娱乐的场域也设定有自己的对象、传统、规则、价值观念、新进入者身份的确定、设备、符号等一系列系统性的构成。〔7:209〕

第三,“语境”、“语体”、“语域”分析通常更关注“语境”、“语体”、“语域”之间在客观要素(如时间、地点等)上的变化,而场域概念则更强调“每一个场域都拥有各自特定的利益形式和特定的幻象,场域创造并维持着它们”^[1:159]。

第四,“语境”、“语体”、“语域”分析中的一大假定就是社会语言生活的一致性,场域概念强调的则是社会生活的冲突性。“场域是力量关系——不仅仅是意义关系——和旨在改变场域的斗争关系的地方,因此也是无休止地变革的地方”^[1:142]。

第五,“语境”、“语体”、“语域”分析的一大假定是社会语言生活的“系统性”:语言生活可以分为“日常语体”、“文艺语体”、“科学语体”、“应用语体”,“文艺语体”又可分为“散文”和“韵文”,“散文”可以分为“小说”和“文学散文”等等,而“文艺语体”的特性一定被“散文”和“韵文”所体现;场域概念,则不但更关注一个个场域之间的重叠、连续和离散等各种可能,同时,更强调“每一个子场域都具有自身的逻辑、规则与常规,而在场域分割的每一个阶段(比如说文学创作的场域),都需要一种真正质的飞跃(比如你从文学的场域降至小说或者戏剧的子场域的层次)”;因为每一个场域都是开放性的,所以子场域只能够有限地而不能完全地表达上位场域的特性。^[1:142]这对于我们语言学中的语用研究不啻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第六,“语境”、“语体”、“语域”分析关注的是彼此之间的“上位概念”与“下位概念”的关系问题;场域关心的则更多是行动者的“位置”问题,也就是行动者如何依其资本的类型和总量,进行支配和服从。场域就是处在不同位置的行动者之间利用手中的资本依靠各自的惯习进行斗争的场所,行动者的策略取决于他们在场域中的位置。

在布迪厄看来,“场域”亦即“分类体系的形成”问题^[1:14],因此,必须分析该场域与“官方”的权力场域相对的位置;必须清楚

识能力的资本。布迪厄发现:现代社会教育系统借助于文化资本的继承性传递在社会结构再生产中起了明显的作用。在现代社会,文化日益成为一种权力资源,资本投资者在文化市场中谋求利润的倾向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高等学校已经成为形塑和复制社会分层的关键因素。

社会资本是指行动者凭借一个比较稳定的,在一定程度上制度化的相互交往且彼此熟识的关系网,而积累起来的资源的总和,不管这种资源是实际存在的还是虚有其表的。社会资本的实质就是群体以集体拥有的资本为其成员所提供的支持。

象征资本(符号资本)是一种被否认的资本,一种不再被看作资本的资本。也可以说,象征资本是这样一种权力形式,即它不被人视为权力,而是被视为对他人的承认、顺从或服务的正当要求。象征资本源于其他资本形式的成功使用,以至于掩盖了自私自利的目的,于是产生了符号效应。

“一个人拥有的资本越多,他就越有能力操纵市场。”^[2:55]当然,“只有在与一个场域的关系中,一种资本才得以存在并且发挥作用”^[1:139]。并且,这种资本并不仅仅取决于行动者个人,“某些特定口号所具有的、自己不需费力就能够促使其他人努力的力量——这正是巫术行动的目标——根源于群体通过努力累计起来的资本,其有效使用从属于一系列的社会条件”^[1:87]。

五、 权力:语言符号关系的核心

布迪厄看来,语言不仅仅是单纯的沟通手段,而且也是整个社会结构进行再建构和再生产的一个中介,同时又是社会中处于不同地位和拥有不同资本的行动者和群体,为了寻求他们的利益、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发挥他们实践能力的中介。

语言关系总是符号权力的关系,通过这种关系,言说者